

中国古代小说讲话

吉林铁路局工人理论组
吉 林 大 学 中 文 系

一九七七年五月

目 录

第一讲	读一点古代小说·····	(1)
第二讲	唐代传奇·····	(13)
第三讲	宋元话本·····	(28)
第四讲	历史小说《三国演义》·····	(42)
第五讲	反面教材《水浒》·····	(65)
第六讲	神话小说《西游记》·····	(91)
第七讲	文言短篇小说集《聊斋志异》·····	(112)
第八讲	讽刺小说《儒林外史》·····	(138)
第九讲	政治历史小说《红楼梦》·····	(161)
第十讲	近代谴责小说·····	(193)

第一讲 读一点古代小说

我国的古代小说，主要是指唐、宋以后出现的用文言或白话写的长篇、短篇小说。它们是封建社会或近代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的产物。那么今天为什么我们还要阅读、研究它呢？因为到目前为止，一切有文字记载的历史，都是阶级斗争的历史。现实的阶级斗争，总是历史的阶级斗争的继续。为了认识和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和路线斗争，除了认真学习马列和毛主席著作，还要努力读一点历史和小说。了解一点中国小说史，有批判地选读一点古代小说，有助于我们认识历史上的阶级斗争，把握一些本质的有规律性的东西，吸取必要的历史经验，从而更好地贯彻党的基本路线，参加现实的阶级斗争。

毛主席指出：“一定的文化是一定社会的政治和经济在观念形态上的反映。”我国的古代小说主要产生在封建社会，是封建社会政治和经济的反映，是那个时代社会生活的艺术概括。优秀的古典小说，为我们提供了当时社会生活的广阔画面，反映了封建社会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阅读这些作品，我们可以看到当时社会的历史面貌，了解那时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正因为如此，我们今天应当把中国古代小说的优秀作品，当作历史来读。不只是看故事，而要把它当作历史来读，这是我们阅读优秀的古代小说一个十分重要的原则。

优秀的古代小说是形象的历史。它通过艺术的典型化所反映的历史，比一般历史记载要更典型、更集中，因而能够广泛

深刻地揭示社会的某些本质，提供丰富的历史经验。无产阶级的革命导师，都是把历史上的优秀古代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马克思在谈到十九世纪英国现实主义小说家时曾经指出，这些小说家“以他们那明白晓畅和令人感动的描写，向世界揭示了政治的和社会的真理，比起政治家、政论家和道德家合起来所作的还多。”恩格斯在谈到巴尔扎克时也说：“他在《人间喜剧》里给我们提供了一部法国社会特别是巴黎‘上流社会’的卓越的现实主义历史”。恩格斯还认为，巴尔扎克所创作的小说，通过艺术形象所反映的法国社会的历史，要比历史教科书更丰富、更具体，“甚至在经济细节方面（如革命以后动产和不动产的重新分配）所学到的东西，也要比从当时所有职业的历史学家、经济学家和统计学家那里学到的全部东西还要多。”可见恩格斯是把巴尔扎克的作品当作历史来读的。列宁为了纪念十九世纪俄国进步作家列夫·托尔斯泰，曾撰写七篇论文，从“俄国革命的性质、革命的动力这个观点”去评价托尔斯泰的作品，主要是他的小说，从中见到了当时农民革命的要求及局限，了解了当时阶级斗争的某些本质方面，和“可以为启发先进阶级提供宝贵材料的批判成分”。列宁在著作中称赞托尔斯泰的小说“是‘俄国革命的镜子’”。无产阶级革命导师对待优秀古代小说的态度，以及将优秀古代小说当作历史来读的实践，为我们树立了学习的榜样。

我们强调把优秀的古代小说当作历史来读，并不是说文学作品本身就是历史，只是史实的简单记录，不是的。要是那样的话，认识过去的历史，读一点历史书不就行了吗？为什么还要提出读一点小说呢？原来一切文艺作品都是一定的社会生活在人类头脑中的反映的产物，而小说与诗歌、散文、戏剧相

比，它既不受时间、空间的限制，又不受篇幅、格律的束缚，适宜于采用多种手法去叙述故事、表现人物，广泛而深刻地去反映历史上的阶级矛盾和阶级斗争。尽管从中未必能得到多少可以考证的史实，但是小说反映社会生活的形象性、鲜明性、丰富性，有助于我们认识当时社会生活的某些本质方面，具有一般历史著作所不能代替的作用。产生于我国封建社会末期的《红楼梦》，是我国小说史上思想性最强、艺术性最高的一部政治历史小说。它通过艺术典型，把封建社会的矛盾冲突熔铸在具体生动的艺术形象之中，较深刻地反映了封建社会的本质。所以，我们坚持用阶级观点，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就有助于我们认识封建社会，有助于我们参加现实斗争。

《红楼梦》里描写的贾府，是一个大官僚兼大地主的贵族家庭，以贾府为主的四大家族，就是封建社会地主阶级的典型代表。《红楼梦》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它通过“护官符”揭示了贾、史、王、薛四大家族显赫的社会地位，补叙金陵一霸薛蟠打死冯渊、抢走英莲的情节，揭开了全书阶级斗争序幕。从第四回我们可以看到：豪门贵族是封建官府的社会支柱，而封建官僚机构只不过是豪门贵族的工具罢了。《红楼梦》正是在第四回这个总纲的统领下，通过贾、史、王、薛四大家族盛衰兴败，描绘了当时动荡的政治风云，揭示了封建社会错综复杂的阶级关系和矛盾斗争，预示了地主阶级必然灭亡的可耻下场。把《红楼梦》当作历史来读，不仅可以帮助我们认识封建社会，而且可以从中总结阶级斗争的规律，这对于我们以古鉴今，在无产阶级专政条件下坚持继续革命是大有好处的。

当然，不是所有的古代小说都正确地反映了历史，有的实际上是歪曲了历史的本质，充当了封建思想的传声筒。其中有

代表性的作品今天还可以充当反面教材。马克思主义者从来就重视反面教材、反面教员的作用。“革命的政党，革命的人民，总是要反复地经受正反两个方面的教育，经过比较和对照，才能够锻炼得成熟起来，才有赢得胜利的保证。轻视反面教员的作用，就不是一个彻底的辩证唯物主义者。”伟大领袖毛主席正是从路线上，从反修防修，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的重大意义上，提出以《水浒》“做反面教材，使人民都知道投降派”的。广大革命群众遵照毛主席的指示，把评论《水浒》作为学习无产阶级专政理论的重要组成部分，作为政治思想战线上反修防修的任务，来积极开展评论活动。通过评论《水浒》，不仅澄清了过去对《水浒》评论的种种错误观点，更重要的是，广大革命群众提高了识别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的能力，从古代投降派宋江身上看清了当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和王张江姚“四人帮”的反动本质。凡是搞修正主义的，都是投降派。古今投降派搞修正主义、投降主义，由于历史条件不同，有着各自历史的和阶级的内容。但是，从本质上说，他们都是腐朽没落的剥削阶级在革命队伍内部的代表人物。古代投降派宋江，是混入农民起义队伍中的地主阶级代表人物，当代投降派刘少奇、林彪，以及王、张、江、姚四人帮虽然披着“共产党员”的外衣，实质上都是钻进党内的地富反坏和新老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正因为如此，今天我们运用马列主义、毛泽东思想评论《水浒》，剖析宋江这个古代投降派的真面目，看一看他所推行的投降主义路线如何破坏革命斗争，瓦解农民起义队伍，葬送起义事业，总结一下两条路线斗争的经验教训，对于今天认识党内走资派的反动性、危害性，从而与之作长期的斗争，很有教益。“走资派还在走”这是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长期

存在的社会现象。只要国内外存在着阶级和阶级斗争，就不可避免地要产生宋江一类的投降派。因此，认真学习毛主席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不但是当前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需要，而且对于我们坚持马克思主义，反对修正主义，贯彻执行毛主席的革命路线，具有深远的意义。

读一点古代小说，还有艺术借鉴的作用。我国古代小说在它的发展过程中，积累了丰富的艺术经验。在艺术的形式、技巧和方法等方面，都有许多值得研究的东西，可以作为发展社会主义新文艺的借鉴。毛主席指出：“我们必须继承一切优秀的文学艺术遗产，批判地吸收其中一切有益的东西，作为我们从此时此地的人民生活中的文学艺术原料创造作品时候的借鉴。有这个借鉴和没有这个借鉴是不同的，这里有文野之分，粗细之分，高低之分，快慢之分。所以我们决不可拒绝继承和借鉴古人和外国人，那怕是封建阶级和资产阶级的东西。”我国古代小说在艺术创作经验方面，有多方面丰富的内容。一些进步作家的创作实践，他们世界观中进步因素对其创作的影响，以及他们在一定程度上接近了劳动群众，对其创作的决定性影响，都能给我们以启发。我国古代小说由于受宋元以来“说话”艺术的影响，在人物描写、情节结构、文学语言等方面，都形成了独特的为人民大众所喜闻乐见的民族风格。优秀的古代小说，都创造了大量的文学语言，它以当时人民口语为基础，又经过加工锤炼，显得准确、精练，富有表现力。《红楼梦》、《儒林外史》以及许多优秀的长、短篇小说，都运用准确、鲜明的个性化的文学语言来刻画人物，表现主题。许多人物的性格，就是从对话中表现出来的，闻其声如见其人。这和“说话”主要诉诸人们的听觉有关。同时也说明历史上进步作家比

较注意向人民群众的口语学习。我国古代小说包括那些由文人创作的文言短篇小说，由于是把人物放在尖锐的矛盾冲突中来表现，所以性格是鲜明的。作品的情节完整，有头有尾，戏剧性强，正是在情节的不断展开中，通过人物的言语行动，来表现典型环境中的典型性格。静止的去写人物的心理和肖像，或者长篇的景物描写，在我国古代小说中较为罕见。这些艺术上的特点，是我国人民所喜闻乐见也是值得我们学习的。

为了现实斗争的需要，我们认为应该读一点古代小说，并且对它进行研究、评论。但是，所有这些只能采取马克思主义的批判继承的态度，而决不能无批判的兼收并蓄。在这方面，无产阶级革命导师也为我们指明了方向，作出了榜样。马克思、恩格斯对于过去时代的进步作家，都曾作过批判性的评价。恩格斯在《诗歌和散文中的德国社会主义》一文中对德国文学史上的重要作家歌德的两面性的分析，如同列宁后来对于列夫·托尔斯泰的分析一样，都进行了深刻的批判。列宁在《关于无产阶级文化的决议的草稿》一文中曾经明确指出：“不是臆造新的无产阶级文化，而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和无产阶级在其专政时代的生活与斗争条件的观点，去发扬现有文化的优秀典范、传统和成果。”这里，列宁指出了对待传统的重要原则：一是要有马克思主义世界观；二是要为无产阶级专政服务。列宁还把每一民族的文化都区别为两种民族文化，即民主主义和社会主义的文化同资产阶级的文化，正是根据马克思主义世界观来观察文化的结果。这就是阶级分析，也就是批判地继承。

在应该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包括古代小说）问题上，伟大领袖毛主席早在一九三八年就明确指出：“学习我们的历史遗产，用马克思主义的方法给以批判的总结，是我们学习的另

一任务。”一九四〇年，毛主席在《新民主主义论》中，又提出了完整的对待文化遗产的原则和政策：“中国的长期封建社会中，创造了灿烂的古代文化。清理古代文化的发展过程，剔除其封建性的糟粕，吸收其民主性的精华，是发展民族新文化提高民族自信心的必要条件；但是决不能无批判地兼收并蓄。必须将古代封建统治阶级的一切腐朽的东西和古代优秀的人民文化即多少带有民主性和革命性的东西区别开来。”一九四二年，在《在延安文艺座谈会上的讲话》中，毛主席在肯定继承和借鉴优秀文学遗产的同时，还指出：“继承和借鉴决不可以变成替代自己的创造，这是决不能替代的。文学艺术中对于古人和外国人的毫无批判的硬搬和模仿，乃是最没有出息的最害人的文学教条主义和艺术教条主义。”毛主席这一系列重要指示，给我们批判地继承文化遗产，指出了明确的方向。

我国的古代小说渊源久远。先秦两汉时期出现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和史传文学，就为后来小说的产生作了多方面的准备。六朝出现了所谓志人和志怪的作品，可以干宝的《搜神记》及刘义庆的《世说新语》为代表。前者多记灵异变化之事，后者则多为当时名士清谈的实录。所以鲁迅说：“六朝人之志怪，却大抵一如今日之记新闻，在当时并非有意做小说，”“六朝志人的小说，也非常简单，同志怪的差不多”，“都很简短，而且当作记事实”；“及至唐时，则为有意识的作小说，这在小说史上可算是一大进步。”唐代传奇有意虚构，文章长，描写曲折，和以前简单的纪实大不相同。宋元以后，起源于人民口头创作的话本开始放出异彩。并且为后来长篇小说的产生作了准备。明清时期出现的长篇和短篇小说较多，在思想和艺术上，都取得了较突出的成就，是我国古代小说创作的繁荣

时期。

我国的古代小说，主要是中国封建社会的产物。在封建社会里，地主阶级是统治阶级，地主阶级的思想是统治思想。农民和手工业工人是封建社会中创造物质财富和创造文化的阶级，但是封建剥削制度却使他们既不能享有物质财富，也没有文化。正因为这样，在小说史上几百部长篇小说，数以万计的短篇小说，绝大部分封建思想占了主导地位，是应该予以剔除的封建性糟粕。少数有进步意义的作品，由于作家大都出身于剥削阶级，观察事物、反映生活很难超出那个阶级的思想体系。在封建社会里，普遍存在的事实是广大劳动人民被剥削被压迫，他们要起来反抗。农民和地主的矛盾是社会的主要矛盾。但是，在古代小说中正确地描写这种社会矛盾的作品几乎没有；就象《红楼梦》这样的好作品，由于作者的思想局限和阶级局限，它也没有对当时社会的主要矛盾——农民和地主阶级的矛盾作出正面反映。甚至在作品中还出现了既歌颂奴隶反抗（《芙蓉女儿诔》）又颂扬镇压农民起义的林四娘（《姽婁词》）这样截然相反的内容。表面上看来，似乎很奇怪，其实这正反映了作者世界观的局限。所以我们对古代小说，包括那些有进步意义的优秀作品，如果不进行批判，不划清界限，其中形形色色的代表地主阶级利益的封建思想、观点、感情就会产生消极作用。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以前，在刘少奇反革命修正主义文艺路线占统治地位时，一些资产阶级学者、权威、曾竭力宣扬古代小说中的封建糟粕，掩盖其阶级实质，混淆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界限。关于《水浒》研究中的错误观点，便是其中突出的一例。更不用说过去的封建文人（如金圣叹之流），近代的资产阶级文人（如胡适之流），在古代小说研

究中所散布的种种谬论了。因此，批判古代小说中的封建性糟粕，批判古代小说研究中的错误观点，是继承这份遗产的前提，同时也是在上层建筑领域里无产阶级对资产阶级实行专政的需要，是一个严肃的课题。

既然继承必须以批判为前提，那么如何进行批判呢？

第一，坚持政治标准第一，艺术标准第二的原则。把作品放在一定的历史条件下去考察，“首先检查它们对待人民的态度如何，在历史上有无进步意义”。凡对当时人民有利、对推动社会进步有利的，则应予以肯定；反之，则应予以否定。在古代小说中，后者的数量居多。其内容或诬蔑农民起义、歌颂封建地主阶级；或鼓吹忠、孝、节、义等封建道德；或宣扬低级庸俗的色情；或崇拜儒家的“天命论”等等，不一而足。我们这个“讲话”，重点在于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一分为二地评价那些基本倾向是好的作品。对《水浒》则是作为反面教材来批判论述的。

第二，坚持马克思主义的阶级分析的方法。列宁早就指出：“马克思主义给我们指出了一条指导性线索，使我们能在这种看来迷离混沌的状态中发现规律性。这条线索就是阶级斗争的理论。”评论古代小说就要把它们放在具体的阶级斗争的背景下去分析它的思想倾向，肯定它在历史上的进步意义。但是，尊重历史的辩证法，给优秀的古代小说以一定的科学地位，不是颂古非今，更不能引导人民群众和青年学生向后看。历史的辩证法告诉我们：历史上进步的东西，在今天则可能变成落后的甚至反动的东西。这特别表现在古代小说描写的一些正面理想人物身上。这些人物或者是小私有者的农民、手工业者，或者是沦入社会底层的妓女，或者是封建贵族的叛逆者，或者是

反对礼教和封建科举的知识分子。由于作家的阶级局限，这些正面人物都不可能提出什么新的社会理想，或者有也很朦胧；他们在处理人和人之间关系的道德观念，也是以私有制为基础的、讲求个人恩怨的“义”。在他们身上都打着封建思想的阶级烙印。那些封建贵族的叛逆者及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反封建不彻底，而且常常散发着剥削阶级颓废思想感情的臭气。对于这些理想人物，在肯定其历史上的进步意义的同时，还要指明其阶级局限，告诉今天的读者，应该批判地对待他们，不能受他们的影响。只有这样，才有助于同传统的观念实行最彻底的决裂。

第三，坚持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各种错误观点。古代小说这块阵地，历来是两个阶级争夺的重要领域。“五·四”以后。反动的资产阶级文人胡适，打着“多研究些问题，少谈些主义”的旗号，矛头直接指向马克思主义。他用唯心主义烦琐考证的资产阶级的伪科学，对古代小说肆意进行歪曲和诬蔑，以达到他为帝国主义、地主官僚资产阶级服务的反动政治目的。他所炮制的《中国章回小说考证》便是打着学术研究的招牌，贩卖反革命私货的标本。在“五·四”运动时期，作为反帝反封建的革命民主主义者的鲁迅，便从革命的需要出发，开始了对中国古代小说的研究。他搜集整理了大量的小说资料，编辑出版了《古小说钩沉》、《唐宋传奇集》、《小说旧闻钞》，并且写出了关于古代小说的第一部专著《中国小说史略》和《中国小说的历史的变迁》。在这两部著作中，鲁迅对中国古代小说起源和发展，以及每个时期重要的作家作品，都进行了深刻的分析评论，显示着战斗的唯物主义的特色。当鲁迅成为一个马克思主义者以后，在他那些充满着斗争精神的杂文中，更是对反动

文人胡适以及形形色色的资产阶级学者进行了针锋相对的斗争。“鲁迅的方向，就是中华民族新文化的方向。”鲁迅批判地继承我国古代文学遗产以及他评论中国古代小说的许多精辟见解，今天仍然给我们以极其重要的启示。

解放以后在毛主席革命路线指引下，经过群众性的批判，经过史无前例的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比较彻底地批判了胡适派资产阶级唯心主义。但是，在整个社会主义时期阶级斗争并没有结束，“无产阶级和资产阶级之间在意识形态方面的阶级斗争，还是长时期的，曲折的，有时甚至是很激烈的。”在古代小说领域内运用阶级分析的方法来进行研究和评论还仅仅是开始。党内资产阶级的代表人物采用各种方法，其中也包括利用古代小说，来腐蚀群众，制造反革命舆论，为其复辟资本主义的反动政治目的服务。王张江姚“四人帮”利用小说进行反党，特别是利用评论《红楼梦》和评论《水浒》进行篡党夺权活动，便是最突出的事例。江青恬不知耻地吹嘘自己是“半个红学家”。公然篡改历史，为自己树碑立传。她胡说《好了歌》及注是什么“主题歌”，同毛主席关于第四回是全书的总纲的指示唱反调。她还借谈“红学”之机，恶毒地影射和攻击敬爱的周总理，攻击伟大领袖毛主席亲自选定、培养的接班人华国锋同志，妄图打倒一大批中央和地方的党政军负责同志，其结果是搬起石头砸自己的脚。一九七五年八月中旬，毛主席发出关于评论《水浒》的重要指示以后，“四人帮”出于不可告人的目的，抢过旗帜为自己捞取政治资本。他们肆意篡改、歪曲毛主席的指示。毛主席说《水浒》“屏晁盖于一百〇八人之外”，到了姚文元的秃笔下却歪曲成“宋江排斥晁盖”。江青甚至窜到大寨胡说什么：“《水浒》的要害是架空晁盖”，“现在中央

就有人架空毛主席”，把矛头直接指向敬爱的周总理和主持中央工作的其他领导同志。一九七六年初，华国锋同志主持中央工作以后，根据毛主席指示，对当时的运动作了部署。“四人帮”却背着党中央、毛主席另搞一套，他们以“联系实际”为名，鼓吹层层揪走资派。与此相配合，在评论《水浒》中也煽动要层层揪“活宋江”，蓄意颠倒社会主义时期的敌我关系，妄图把中央到地方一大批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党政军干部都打成“活宋江”、“投降派”，真是丧心病狂，恶毒已极！毛主席早就指出：“利用小说进行反党活动，是一大发明。”“四人帮”正是这样干的。他们的所作所为告诉我们，在评论研究古代小说领域里两个阶级、两条路线的斗争将长期存在，因此阅读和评论古代小说，一定要注意批判资产阶级、修正主义的错误观点，为巩固无产阶级专政，防止资本主义复辟服务。

第二讲 唐代传奇

一 唐代传奇的产生和发展

唐代传奇，是唐代作家用文言写的短篇小说。封建文人从儒家传统观念出发，把“释经阐道”的诗文当作正统文学，而认为“不本经传”、“作意好奇”的小说是卑下的，所以就贬低它叫它“传奇”。这个名称最早出现在晚唐作家裴铏的《传奇》一书中，后来人们就把唐代小说概称为“传奇”。

我国古代小说，从先秦两汉的神话传说、寓言故事、史传文学到六朝时期的志怪志人，经过了长期的准备，积累了一定的创作经验。到了唐代，传奇的出现使小说作为一种独立的文学形式，已经初步形成，具有了较为丰富的现实内容和比较完备的艺术形式。正如鲁迅所说：“小说亦如诗，至唐代而一变，虽尚不离于搜奇记逸，然叙述宛转，文辞华艳，与六朝之粗陈梗概者较，演进之迹甚明，而尤显者乃在是时则始有意为小说。”唐代作家这种有意识的创作活动，突破了六朝志怪题材的局限，开始面向社会人生，作品中的主人公也逐渐由神鬼灵怪变成了现实生活中的人。在形象塑造、情节结构和语言运用方面，都有明显的进步。然而，由于历史条件和作家阶级立场的局限，唐代传奇无论在思想内容和艺术形式方面都存在着严重的消极因素，不能评价过高。应当指出，大多数传奇纯属

封建糟粕，即使少数作品在当时具有某种现实意义，但其中也包含着不少封建毒素。因此，我们对待唐代传奇必须坚持批判继承的原则，绝不当采取兼收并蓄的态度。

唐代传奇的产生和发展，是与唐朝时期的社会经济和阶级斗争分不开的。隋末农民战争打击了反动的封建统治，推翻了极其腐朽暴虐的隋王朝，推动了社会生产的发展。从唐初到开元、天宝年间，封建经济一度出现了表面繁荣的景象。但封建社会内部的阶级矛盾由于土地兼并和残酷的封建剥削而日益激化，农民起义不断发生。与此同时，统治阶级内部财产和权力再分配的斗争也趋于表面化，形成了党争迭起和藩镇割据的局面。公元八世纪中叶的“安史之乱”使唐王朝开始走下坡路，封建统治岌岌可危。在农业生产日趋凋敝的同时，城市经济却得到了畸形的发展。出现了一批象长安、洛阳、扬州等以消费为中心的大都市。在这些地方不但盘据着大批封建官吏，而且也云集了不少富商大贾。他们利用各种手段，对劳动人民进行无情的榨取，过着极端腐朽的寄生虫生活。他们追求声色佚乐，流连倡楼妓院，大肆挥霍，豪奢无度。同时小商贩、手工业者、无业游民、落拓文人的增加，也使城市居民迅速增长。于是适应市民生活的各种娱乐行业，便相继出现了。唐代传奇就是在这样的社会土壤里产生和发展起来的。

唐初实行科举考试，选拔人材，使大批中小地主阶级知识分子走上仕途。唐传奇的作者如沈既济、蒋防、元稹、白行简等人多出自寒门。他们为了取得当权者的赏识，常常以编写传奇故事来显示自己的才华。正如鲁迅所指出的：“唐以诗文取士，但也看社会上的名声，所以士子入京应试，也许预先干谒名公，呈献诗文，冀其称誉，这诗文叫做‘行卷’。诗文既

滥，人不欲观，有的就用传奇文，来希图一新耳目，获得特效了，于是那时的传奇文，也就和‘敲门砖’很有关系。”这种社会风气，无疑对传奇的创作产生了一定影响。

唐代传奇的兴起，还有文学发展本身的原因。六朝志怪为唐传奇的产生作了准备，志怪的题材内容和表现方法，被唐初传奇作者所承袭而有所发展。唐诗和唐代散文，对传奇的创作也有影响。唐代民间文学对传奇作者提供了许多启示。据段成式《酉阳杂俎》记载，中唐前后，民间流行着一种“市人小说”，当时叫做“说话”。传奇作者受“说话”的影响，而将当时流传的民间故事加以整理，进行再创作。如白行简的《李娃传》，就是根据民间说话《一枝花》改写成的。唐代变文散韵夹杂的特点，在某些传奇作品中也可以看到它的影响。

唐代传奇的发展，大致可以分为三个时期：

1. 初唐时期。这一时期基本上还是承袭六朝志怪的余风，内容仍旧是“徵异话奇”，艺术上有所进步。作品的数量不多，现存的仅有三篇。王度的《古镜记》，写一面古镜制妖、降魔、治病的故事，是最早的传奇作品。无名氏的《补江总白猿传》，写梁将欧阳纥的妻子被白猿精摄去，欧带军入山杀死白猿，但其妻已怀孕，后生一子，相貌和猿猴很相似。有人以为这篇传奇是攻击欧阳询的。张文成的《游仙窟》，通过游仙来写士大夫知识分子腐朽的狎妓生活。这些作品荒诞不经，充满了怪异色彩，思想内容毫无可取之处。在艺术表现、情节结构、人物刻划方面起过承先启后的作用。

2. 中唐时期。这是唐传奇的繁盛期。作家作品的数量都比较多，从内容到形式都有明显的进步。怪异的风气虽未完全